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二期 ——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1c)

【史海钩沉】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	卜伟华
【口述历史】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吴 忠 · 陈楚三 · 李大震
【当事者说】	“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驻地的清查工作	武建华
【文革回顾】	彼得·汉纳姆谈2 5 6三叉戟黑匣子	舒 云
【往事非烟】	“文革”时期的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	孤 鸿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文革中死于外地武斗的北京红卫兵

• 卜伟华 •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现象屡屡发生，但未见有比较全面详细的资料可供检索，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案例做一介绍，涉及的地方有青海西宁市、四川成都市、宜宾市、重庆市、河南开封市、江西抚州市、湖南常德市、湘乡县、湖北武汉市、辽宁鞍山市、江苏南通市、浙江温州市、安徽省。北京红卫兵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希望有了解情况的朋友将自己了解的情况介绍给大家，以助于文革史研究的深入。

◇ 张大海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发生“二·二三”事件。西宁地区驻军联合指挥部对占据青海日报社的造反派进行了武装镇压，酿成重大流血事件。这次事件造成169人死亡，178人受伤。〔1〕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学生张大海。

关于张大海，原来只知道他是人大附中的学生，是人大附中红卫兵（老兵）的成员。清华

附中红卫兵编印的《红卫兵诗词》中现存两首悼念张大海的诗词，其中一首“卜算子”词曰：“壮士辞北京，热血喷西宁。捍卫真理宁玉碎，一死泰山轻。英魂永不散，丹心照汗青。继承先烈革命志，不愧红卫兵。”〔2〕

后来在网上搜索张大海，在张忠真的博客上发现一份人大附中高六六一班全体学生名单，其中就有张大海的名字。作为张大海的同班同学，张忠真向我介绍说：“张大海确实是我的同学。我们一起在人大附中同窗了三年，他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子弟，学习很努力对人很热情。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很爱帮助人。文革中他加入红卫兵，在朴素的阶级感情的裹挟下是个冲锋陷阵的角色。我们知道他去了青海西宁，当知道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同学们很为他惋惜。和他同去西宁的好像还有李小平、岳丽珍、秦怡、张秀珍等同学。他的家在北京市丰台区，具体地址不详。”高六六级是高中三年级，张大海遇难时的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

◇ 李全华

1967年5月6日，成都国营峨眉机械厂（即132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当天上午，该厂造反派调集厂外造反派围攻厂内保守派，双方用砖头、棍棒武斗。当造反派围攻该厂保密生产区时，退守生产厂房的职工动用民兵武装的各种枪支，向围攻者开枪射击，打死48人，打伤127人。〔3〕在死亡者中有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

杜钧福在题为《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回忆中介绍了他当年“5·6”惨案后到成都了解到的情况：“当时（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4〕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报》1967年5月3日出版的第35期，报道了5月10日下午“首都革命派”召开追悼5月6日在四川成都两派群众组织冲突中不幸中弹身亡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李全华的大会情况。

◇ 张玄杰、王俊英

1967年5月13日，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成员张玄杰（机械系61级，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无线电系64级，共青团员）死于四川宜宾武斗。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记载：1967年5月13日至19日，宜宾两派群众组织因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问题有不同看法而尖锐对立，发展到有数千人参与，使用钢钎、木棒、石头等为武器，在宜宾城区进行武斗，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300多间房屋被破坏。〔5〕

据宜宾造反派头头谢英富回忆：5月13日，宜宾造反派组织游行，遭到保守派阻击而不得不撤退避让。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大规模的武斗发生，造反派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到军分区去请求解放军出面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保守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保守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保守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用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6〕

据王俊英的同班同学介绍，1967年3、4月间，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时曾应邀去过北京工业大学，后刘、张在得到中央支持，受命回宜宾筹建革委会时，从北京带上一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去了很多人，张玄杰、王俊英即在其中。这位同学回忆说：“临走时，在我们宿舍，中午大家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但是没有人睡觉，都在说上四川的事。有的同学说现在四川武斗挺厉害的，你们可千万小心，有的说你们要‘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王俊英接着说：‘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说完大家哄堂大笑。说者无心，都当是玩笑话。谁也没往心里去。身在北京，根本想不到真的武斗会打死人，更想不到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残酷，灾难被言中，真的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五月份四川武斗不断升级，王俊英，唐林，王俭在四川宜宾——刘结挺、张西挺的根据地，真的赶上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武斗的群众手举着带钉子的狼牙棒冲过来时，王俊英、唐林这些北京去的红卫兵只是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夹在两派之间，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而此时大棒已经朝他们头上挥去，据说，上午九点多王俊英被打倒后直到下午五点去世，中间就没醒过。她的脑袋打裂了，脑浆都流出来了。就这样她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四川，和她同时被打死的还有六系的男生张玄杰。而唐林当棒子向她挥来的时候她迅速地用双手抱住了头，她的手被打伤，但生命却保住了。”〔7〕

5月19日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召开“向王俊英、张玄杰烈士学习继承烈士遗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王俊英的母亲、张玄杰的大姐讲了话，王母讲话中说，王俊英是她的独生女，生前曾表示为保卫毛主席牺牲了也心甘，“这回她的愿望总算达到了”。北京市革委负责人吴德、常委周景方到校表示慰问。而东方红的对立派学生对吴德此举颇不以为然，群起而围攻之，“吴德被挤得满头大汗，在人群中无法前行”〔8〕。

由岩佐昌彰、刘福春编选的《红卫兵诗选》，2001年3月由日本福冈市的中国书店出版。这本《红卫兵诗选》中，有一首署名为东方红公社“英特纳雄耐尔”的诗，题目为《在战火中得到永生》。这首诗所描述的正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战士张玄杰、王俊英“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英勇牺牲”的情景：“……迎着刺刀木棒，/ 高举红书，昂首阔步。/ 面对围攻毒打，/ 坚贞不屈，岿然不动。/ 他们不愧为东方红的好战士，/ 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红小兵。”〔9〕

◇ 刘天章

1967年8月20日，北航红旗的学生刘天章在河南串联时，因介入开封化肥厂的两派武斗，被保守派开枪打死。

北航红旗早期的主要负责人戴维堤在他的长篇回忆《逝者如斯》中说：“刘天章是普通干部子弟，为人正直朴实，艰苦朴素，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思想比较激进，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刘天章与我很熟，本来，他是约我和他一块去河南串联的。我因工作忙，脱不开身，他便一个人去了开封，结果血染黄沙，命丧古城。”北航革委会成立了数十人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刘天章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刘天章的骨灰放到俱乐部门口灵堂，北航红旗战士们为刘天章守灵。一些炮打过中央文革的高干子女被押来跪灵请罪，红旗中的一些学生发誓要为刘天章报仇，许多对北航红旗不满的人吓得敢怒不敢言。那几天北航充满了“红色恐怖”。8月24日，恰逢李明清“炮轰……”大字报〔10〕发表一周年。这天晚饭后，一些北航红旗的学生陆续把几个“炮打中央文革”和写过“炮轰……”大字报的学生拉到东操场批斗，其中有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明清，地质部长孙大光之女孙茜玲，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赖锐锐，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之子苏晓前和工农子弟吴仙虎等人。李明清和吴仙虎被打致死。后来，工、军宣队进北航后抓凶手，查了半天，也定不了谁是主要凶手。最后，把发起批斗和参与打人较厉害的几个学生抓起来判了几年刑。〔11〕

后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政治部编印了《红卫兵的好榜样——刘天章》一书。此书现在还可在“中国收藏在线”等网站上买到。

◇ 包康玲

1967年8月18日，年仅21岁的北京市五十三中学语文教师包康玲在重庆两派武斗中被打死。当天“凌晨，大坪、潘家坪一带的市民被晴空霹雳般的枪炮声惊醒。巨大的爆炸声是重大八一五武斗队炮班的榴弹炮从虎头岩向几处准备进攻的地点进行的首轮炮击。八一五派向反到底派占据的石油路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和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大坪重庆医学院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恶战至20日，死上百人，河运学校、医学院、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被打坏，邮电器材厂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武斗指挥下令炸毁……”（12）

1967年10月16日出版的重庆反到底派小报《东方欲晓》上刊登了包康玲追悼会的情况和包康玲生平简介。

包康玲1965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分配到北京53中作语文教师。1966年12月和1967年5月两度来到重庆，是坚决支持重庆反到底派的首都赴渝兵团的成员。在重庆武斗急剧升级的时刻，包康玲誓言“与山城反到底派共存亡！”在此期间，包康玲3次负伤。8月18日，在潘家坪战役中，包康玲被子弹击中，子弹从左颈穿入直到肺部，经多方抢救无效，于8月20日死亡。

◇ 贺英、潘仲成

1967年8月，北京一〇一中两名学生贺英和潘仲成到江西串连，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两人均为19岁。2009年出版的《证照中国——1966—1976》一书中收录了北京一〇一中学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出的讣告。

讣 告

我首都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以沉痛的心情向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发出讣告如下：

在滔滔的赣江边，英雄的南昌城下，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支持革命造反派，八月二十四日，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贺英、潘仲成同志，是我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优秀战士，前不久奔赴江西，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与当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生死与共，并肩战斗。

八月二十四日，江西反革命组织“联总”抚州“32111”疯狂进行反革命暴乱。早六时听此消息，贺英、潘仲成同志及首都大中学校红代会战友、江西革命造反派奔赴抚州。八点钟赶到温泉镇，哪想到反革命暴徒设下埋伏，不幸遭伏击，暴徒们向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地下了毒手。

暴徒们的机枪喷着火舌，火舌向着革命小将射去！面对死亡何所惧，革命小将高呼“毛主席万岁”！与暴徒英勇搏斗！首都和江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倒在同一血泊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与枪声交织在一起。赣水为我哀悼，群山为我抽泣，贺英、潘仲成同志在这次战斗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二烈士均年十九岁。贺英同志，是我红代会101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革命委员会委员，生前任我公社对外作战部部长。潘仲成同志，是中学红代会组织部工作人员。

……

我们最亲密的战友，贺英、潘仲成同志英勇地牺牲了，他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仇我们要报！让我们接过他们手中的用鲜血染红的战旗，奋勇前进！不把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彻底打倒，决不罢休！不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死不瞑目！

烈士们，安息吧！

打倒刘邓陶！打倒江西“联总”！镇压抚州 3 2 1 1 1 的反革命暴徒！

为革命牺牲的贺英烈士永垂不朽！

为革命牺牲的潘仲成烈士永垂不朽！死难烈士万岁！

（烈士灵堂设一 0 一中）

首都中学红代会 一 0 一中毛泽东主义公社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1 3 ）

1 9 6 7 年 6 月 2 8 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 9 日凌晨，江西省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 6 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 1 4 ）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 2 2 3 具。（ 1 5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认为问题严重，遂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 1 6 ）

8 月 1 0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但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够马上平息江西的动乱。8 月 2 4 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 6 5 人。（ 1 7 ）

这 6 5 人当中，应该包括北京一 0 一中的贺英、潘仲成两人。

◇ 李磊落、肖化时、刘庆、关于正

唐少杰整理的《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中列出了 4 名在外地武斗中死亡的清华大学学生，他们是：

李磊落，男，2 2 岁。清华电机系电 9 班学生。1 9 6 7 年 8 月 7 日在湖南常德参加群众武斗时，遭遇机枪扫射致死。

肖化时，男。清华无线电系无 7 0 6 班学生。中共党员。1 9 6 7 年 8 月 1 1 日参加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横渡长江的活动中，与武汉“百万雄师”进行武斗致死。（ 1 8 ）

刘庆（刘仁堂），男，2 3 岁。清华无线电系无 9 1 班学生。1 9 6 7 年 8 月中旬在辽宁鞍山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关于正，男，2 2 岁。清华动力与农业机械工程系农 9 班学生。1 9 6 7 年 8 月 2 9 日在江苏南通市参加当地群众武斗时致死。（ 1 9 ）

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赴鞍纵队”写的一篇题为《拥军的模范，支左的模范》的文章中介绍了刘庆的一些事迹：他和“赴鞍纵队”曾与驻鞍军队谈了七、八次，把我们了解情况统统讲了出来。8月13日，中央对鞍山表态前一星期，刘庆起草对鞍山局势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鞍山“捍卫队”。这声明对鞍山驻军和支左的三一七四部队给予极高的评价，给林杰之流“揪军内一小撮”反动理论当头一棒。“鞍山革命派为了纪念他、学习他，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召开了有八万人参加的追悼会。”（20）

9月18日，清华《井冈山》报刊登悼念羌于正的文章，文中说：“8月28日，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数万农民包围南通城。明晃晃的大刀，乌黑黑枪口，雨点般落下的石块，整夜喷吐硫酸的水龙……。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你冲杀在第一线……战斗的最后一刻，暴徒们冲到三楼楼梯口，你还要爬到窗口去接电话线，万恶的子弹夺去了你的生命。”

清华《井冈山》报第73期报道了李磊落（在湖南常德武斗中）、萧化时（在武汉八一渡江活动中）身亡消息和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的悼念文章《李磊落同志永垂不朽》。

8月13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举行肖化时、李磊落追悼大会。9月18日，又举行刘庆、羌于正追悼大会。兵团总部政治部决定：建议党组织恢复后追认在武斗中“牺牲”的李磊落（8月7日死于湖南常德）、刘庆（8月31日死于辽宁鞍山）、羌于正（8月29日死于江苏南通）三“烈士”为中共正式党员。

◇ 周锡坤

在戴维堤的长篇回忆《逝者如斯》中还提到另一个死在外地武斗中的北航红旗战士。“1967年8、9月间，北航红旗战士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城被保守派抓住后枪杀于县城街头，身上中弹数十发。”（21）仅此一句而已。所幸在“恒久感受的博客”上，找到一篇题为《四十五年前的步行长征》的回忆文章，记述1966年冬，北京航空学院100多位同学步行长征的经历，配发了多幅当时留下来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的说明文字为：“晚上，队友周锡坤在篝火前读毛选‘井冈山的斗争’”。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周锡坤的身影。半年多后，周锡坤在湖南湘乡县遇难。

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线索，如：

1967年8月15日，北京大学原井冈山公社王建新、新北大公社周瑞青在温州武斗中被机枪扫中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是北京大学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在校内打得不亦乐乎，而在外地，他们两个对立组织的成员却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

196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对59期《铁路情况快报》作出批示。《快报》反映四川大批学生无票扒车到京，从成都开出的客车每列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北京水电学院一学生在安徽武斗被打死，尸体昨运到郑州车站，要求运京与另一派对质，铁道部未同意，动员他们就地火化。（22）

注释：

（1）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第194—197页。

（2）清华附中红卫兵：《红卫兵诗词》，1968年5月，油印本第15页。

（3）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4) 杜钧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unfudu>)。

(5)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 第315—316页。

(6) 见宜宾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7) 见《瑰丽夕阳的博客》(<http://lhxing1946.blog.163.com/blog/static/1288467252010102824723324/>)。

(8) 见《瑰丽夕阳的博客》(<http://lhxing1946.blog.163.com/blog/static/1288467252010102824723324/>)。

(9) 杨剑龙:《狂热年代红卫兵情感的宣泄与记录——读〈红卫兵诗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1月号,总第10期。

(10)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李明清、赖锐锐、王晓东、李洪瑞、刘福曾于1966年8月24日贴出题为《炮轰……》的大字报,其中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既然运动是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而且北大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又是经过了长期的筹备,首先又经过他老人家亲自审阅过,对于派工作组的问题难道他老人家会不知道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在北京的党中央常委究竟听谁的?又是怎么研究决定的,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等同志都做出了检查,可是把责任承担下来了后,工作组又该担负什么责任呢?没有明确的指示,所以造成了同学们对工作组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我们认为这是某些同志应该负责任的。”

(11) 戴维堤:《逝者如斯》。

(12)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出版,2010年版,第225页。

(13) 许善斌:《证照中国:1966—1976》,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14)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15) 据《周总理第六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年8月5日)。另据“大联筹”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认出来。”

(16) 7月4日,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上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个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370页。

(17)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18) 肖化时的死亡时间有误。邱心伟、原蜀育主编的《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中收录了清华井冈山关于肖化时的讣告,其中肖化时死亡的日期为8月1日。经查证,1967年8月1日,武汉造反派组织了横渡长江活动,由于组织不周,在武昌长江大桥下水时,拥挤践踏,死亡100多人,造成渡江史上最大惨案。肖化时即死于这次惨案,他的死亡原因不是参加武斗。但当时造反派称惨案是走资派和百万雄师制造的,所以肖的讣告中说肖“于1967年8月1日参加武汉市革命造反派组织的横渡长江活动,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武汉‘百万雄师’中一小撮混蛋制造的‘八一惨案’中英勇牺牲。”见邱心伟、原蜀育主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版,第242—243页。

(19) 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20) 见《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大事日志》,第268页。

(21) 戴维堤:《逝者如斯》。

〔 2 2 〕 这两条线索均无明确出处，详细情况还待继续查证落实。

□ 选自卜伟华博客

~~~~~

【口述历史】

吴忠谈“九一三”事件

• 吴 忠 • 陈楚三 • 李大震 •

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

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 李大震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晚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

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

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筛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总理说，我认为这样写是对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把江青顶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江青说，讨论问题你不要发脾气嘛！我们都在场，总理没有发脾气呀？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我认为林立衡应该是立功受奖的人，够大义灭亲的了，是个好同志，应该让全国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抢救过来了。林彪逃跑，亲生女儿揭发他，对我们党的形象有什么不好？总理写得好：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现在我也认为应该宣传林立衡。

直升机上有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军事部署，对苏方向上的雷达部署都有；还有好多录音带，有一盘录音带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文件”，听不清楚；后拿到公安部，技术人员把转速搞对了就听清了，是黄永胜给叶群打电话，谈私生活问题，林立果录下来了，录的质量不好，但可以听清楚。审讯黄永胜时给他放，他有意见，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搞这个不严肃。

还查到三万外币，我看是德国马克，报告总理，总理说不对，哪来马克呢？后来知道是三万美金，又报告了总理。

那一段只有我们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机关的人不知道；向总理报告情况，处理问题，机关的人判断与林彪有关，但究竟是啥问题不清楚。

飞机上文件很多，要带到苏联去作为见面礼，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带去干啥？都是些重要机密，总理判断对了，他说里面一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叫毁掉了，片纸都不能丢掉。果然总理说得对。

直升机是要往北飞，让飞行员往乌兰巴托飞，李伟信还活着。林彪的飞机一直向北飞，急急忙忙，机场有报告；有一次我向总理讲，不能打下来？总理说，你说的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毗了我两句。直升机从北京起飞，两架没有联络，跑的时间一致，北空的飞机起飞拦截把

它搞回来了。拦截还不是主要的，特别是驾驶员，他是中队长，不明情况，大队说找他去开会，正在睡觉，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乌兰巴托飞，枪逼着的，他觉得是要投敌，把罗盘搞乱了，周宇驰也搞不清往哪个方向飞了，看到钓鱼台向后转了一圈，一看怎么又回到北京了？这时到渤海所上空，飞机迫降，刚一落地就把驾驶员打死了。驾驶员是有功的，把罗盘搞乱了，不往乌兰巴托飞。

9月13日以后，每天注意听苏联广播，林彪到苏联后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啊，发表什么文章啊，发表什么演说啊，但一直听不到；过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议，说我们有一架飞机进入他的领空，落在他的领土上了。我们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飞机，死的人甩出来，没有烧毁，送回来的照片上，林彪、叶群都认得出来，它是没油了，迫降的，领航员也没有，油也没加足，非常仓促，可见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但是照片上认得很清楚，林彪的膝盖骨露出来，搞断了，女尸（叶群）看得很清楚，肿胀起来了，并没有人员烧死，是迫降时飞机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条沟，机翼在山冈上刮断了，翻下来造成的，看样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来的。

9月13日上午总理布置任务后，同时做了决定：保密。知密范围很小。为了首都和全国的稳定、平静，广播还像过去一样，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知道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还这样讲，维持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抓黄吴李邱，毛主席、周总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当中，中央的文件还要让他们看。找到林彪手令、飞机编号、给黄永胜的信以后才做出决定，隔离审查。9月24号晚上就准备了，总理找我们谈，抓起来放到哪里？我和吴德参加，杨俊生没参加。我考虑不能放在城里，警卫三师是新四军的，和黄吴李邱瓜葛少，吴法宪是新四军三师的，不是江南的，警卫三师是江南黄克诚的部队，总理同意了。商量结果，黄永胜由我押送到七团，怀柔；吴法宪放到三师九团，八里桥；邱会作放到牛栏山，炮团；李作鹏放在三师师部。这时天还没亮，预定抓他们是八点召开会议，战士还在车上睡觉。曾绍东押李作鹏。

开会时，邱会作晚到十五分钟，去机场送行回来晚了。总理很敏感，是不是他发觉了？既然黄永胜烧文件，他也可能发觉不来了？总理说，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问我：你有机动部队没有，我说有；有多少？我说城外两个师，城里一个团刚拉练回来在半壁店，总理说好，由这个团执行，到西山100号，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这时邱会作来了。

总理在新疆厅找黄吴李邱谈话，指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你们了解不少情况，要老实交代。黄永胜表态，保证。总理叫我去，告诉黄永胜你到吴忠那里去，好好交代；黄永胜表示，拥护中央保护审查的决定。

我押送黄永胜到三师七团，安排好后我离开时，黄永胜把我叫回去，要我向总理报告：“只要我知道的情况，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拥护中央决定对我隔离审查。”

林彪专案小组十个人，里面还有黄吴李邱；后来中央让我和李震审讯黄吴李邱，我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是公安部长，但不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很客气，我还是让李震同志出头办这件事。

审讯时，黄永胜不交代什么问题，给他放那盘录音，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不严肃。拿出林

彪给他的信，他说没收到。王飞给他送的信，他说不是这封信。既然是写给黄永胜的信，为什么在周宇驰手里？是不是周宇驰让黄永胜看信后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测，不能认定。王飞送的是否是这封信也无法断定。黄永胜一直说没看到过这封信，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看过这封信，理由就是这封信在周宇驰手里。但公审“四人帮”时，法庭上向黄永胜出示这封信时，黄永胜说看到了。我心里想，黄永胜可能紧张，一是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总理给他看过这封信，他没说明清楚，是于新野、周宇驰给你看到过，还是总理给你看到过？没交代清楚，我也没法断定。我们搞了那么久他都不承认。

那时认为吴法宪态度最好，林彪给他交了底啊，飞广州啊，等等，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决定要宽大吴法宪，给他找房子。我找了，马寅初的房子准备给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后还有个问题让他交代，他说的含糊糊糊。后来就没有给他那个房子。毛主席说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经问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还有个问题要交代！李作鹏，总理问他，山海关机场已经通知了，不准起飞，你为什么要他起飞？为什么修改了总理指示？邱会作也没交代什么问题。

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那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这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已经查到黄吴李邱、叶群头上，实际上也查到林彪头上了，他想用这个办法制止，不要再查了，不要再搞下去了，这是我的理解，把班底保住，这是一；第二，卫戍区这一条，我看了有后怕的感觉，也不用给你施加影响，也不拉你，拉你会报告，传达到每个士兵，每隔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毛主席要是通过了他就掌握了卫戍区，说是“防止野心家捣鬼”，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给士兵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况他是第一副主席，党章上写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机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马上把你干掉，这就不乱令了。用这个办法掌握卫戍区，倒真是个高明的办法，比请吃饭、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报告了他就暴露了，还真没有好办法对付他。但他没有送到毛主席那儿，他知道毛主席是个敏感的人，送给毛主席谁知道会怎么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会不会露马脚呢？他感到没把握，才没有上送，都已经抄清了呀！看来林彪这时候想的点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卫戍区控制起来，必要时他来“面授机宜”，让抓谁就得抓谁，这不能说不厉害。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着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个材料很重要，庐山会议后林彪看到已经搞到黄吴李邱头上、搞到叶群头上，已经搞到他头上了，他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危局，这个办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抄清了以后还搁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最后决定不送，因为没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馅儿了。这个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 原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

【当事者说】

“九一三”事件后对林彪驻地的清查工作

• 武建华 •

◇ 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时期林立衡的安全问题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的位置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到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群就此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八三四一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外，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得知，最初林立衡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打电话给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美女张某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某，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拉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文普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八三四一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讲这件事。刘吉纯又同林彪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宋德金回忆说：刘吉纯把我拉到偏僻处，悄悄地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回忆：9月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号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

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么，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林立衡便去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内勤的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首长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首长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蔽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立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站上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进入公务车；在北京站下车时，汽车也要开到站台，人员直接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张清林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

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住进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吃饭。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里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

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护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 参与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湾的文件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汪东兴同志安排我们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和我三人。

我们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号楼的。

北戴河是国内著名的避暑胜地，在河北秦皇岛市西南十五公里处。为了准备党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工作、避暑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警卫局就派人去北戴河开始经营。当时设置了一个小的机构。对外称中直机关干休所，对内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驻北戴河管理科。当时负责人是警卫局服务处副处长何明孝，他带领一批干部和一部分勤杂人员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那里安置了20多位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又经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城的老红军。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曾为党中央挑过文书档案，为中央领导人做过饭，饲养过马匹，做过大量的勤杂工作，为人民作过贡献。进城后因年纪大、文化水平低、身体有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结婚成家，抚养后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里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滨西区建起中直机关避暑区，先后接管了“英国府”、“美国府”以及“吴家楼”等楼房、别墅；进行房屋维修，道路铺设，完善水、电、通信设备及在海滨浴场拉起防鲨鱼网；并根据当时需要，又盖了部分平房。

1956年到1960年，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借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在北戴河修建了大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机房、车库等公用场所。此后，又在联峰山下为林彪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叛逃出境的。

我们一行进入室内，仔细查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室、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橱柜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张、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开始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彪、叶群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地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入96号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份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份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

调来北戴河准备带走的。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经我们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们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务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国庆节了。王歆因事换成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与机要室职能不同）处长葛振基。国庆节，我们没有休息就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大院分为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所，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除几间办公室外，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文件集中放在二层的一个大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地分存在橱柜中。我们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委、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我们都是件件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我们不仅不能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林彪专案组已经成立，专案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纪登奎和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我们拣选出来的文件，开始时一件件地送到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

◇ 看到、听到的一些新鲜事

“讲文件”

林彪同中央别的首长不一样，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电报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讲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或在地毯上踱步。他一边听，一边手里摆弄着一盒特制的高级火柴。他擦着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着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嗅后，就扔在了下边。然后，他又擦着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的火柴杆有几十根了，但还继续擦。连在批件上画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件”。

“讲文件”有很多要求和规矩。选文件时，要选最重要的；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讲文件时，只能讲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林彪听后因紧张而出汗，那就砸锅了。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由内勤临时去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去。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讲文件时间不能长，一天讲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庞杂的秘书班子

毛家湾内工作人员有多少？听起来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20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作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选美）的、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借助图表学习，可以提纲挈领，加强记忆，比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径”的一贯思想。至于后来把绘制图表弄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则要归之于叶群了。在一段时间里，叶群要求把许多学科的知识都反映在图表里。许多人分别在编写、绘制、裱糊，日夜忙碌着，简直在林办办起了一个连续作业的小作坊。

林彪的卧室、书房挂满了字条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的床头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帧装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还有，林彪写给叶群已经裱糊好了的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以及翻查卡片等，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林批孔”用。

林彪或根据自身的“生活实录”，或从医书上翻到的，或从身边工作人员日常讲到的，用毛笔写了许多字条，横七竖八，挂满卧室、书房等处。其中有：“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吃鸡蛋会内热，吃芝麻可生黑发，喝茶叶会升高体温，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在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到1971年底顺利结束了。我们清查以后，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

清查处理林彪毛家湾的物品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汪东兴同志交代我把这件事抓一抓。

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一直由负责林彪警卫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看管，现在要处理这些物品，少不了熟悉这些情况的同志。经研究，先后组成有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六中队指导员刘志升等同志参加的清查处理物品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组人员也有调整变化，但于仁堂副大队长一直清查处理到底。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

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

林彪卧室

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森。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进口的大块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

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六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

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

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件。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陈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摆满了一卷卷字画，就在我们移交前，工作人员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近距离地观赏数次，大饱眼福，尤其是对《清明上河图》的那些生动描绘，更是牢记不忘。

叶群卧室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有古瓷瓶壶，有玛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林立果卧室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需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处地方，插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后，一按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录音。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后来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做参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待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其他物品的处理

毛家湾的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查处理时均保持原样未动。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大量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

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我们给汪东兴同志写了报告，汪看后又送请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

□ 原载《党史博览》2011年12期

~~~~~

# 【文革回顾】

彼得·汉纳姆谈256三叉戟黑匣子

· 舒 云 ·

2012年1月5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研究系孙万国教授应舒云之请电话访问了居住悉尼的彼得·汉纳姆，请他谈谈256三叉戟的黑匣子。汉纳姆曾在北京任驻外记者，也曾到过蒙古，他曾披露256号三叉戟的黑匣子里没有与地面通话的声音。

1992年5月，彼得·汉纳姆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到蒙古温都尔汗坠机现场采访，调查证实了林彪和叶群和飞机一起坠毁。汉纳姆说：“六个多月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转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彪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

汉纳姆对孙万国教授说：林彪飞机的这个黑匣子里没有透出更多的信息，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声音。因为这架三叉戟是转由巴基斯坦引进的，属于60年代生产的设备，黑匣子里的录音机和录音带的质量都不好，录制时间亦甚短。汉纳姆本人并未能听到原始录音，但根据他所采访的克格勃人士的转述，录音带里面并没有听到林彪、叶群或林立果的声音，也没有机上打斗的声音。

这个黑匣子里最有用的信息是这架飞机飞进蒙古后，一直向北飞。驻蒙苏军发现后，向这架飞机喊话，警告他们不能再往前飞，再往前飞就要打了。这架飞机没有任何回答，但是不久就转向了，转向南。

汉纳姆还谈到林彪飞机坠毁现场附近其实有一个小机场，但当时机场没有打开夜航设备。

汉纳姆表示，他没有看到前苏联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字档案。当孙万国教授问为什么过了40年，前苏联仍不公开九一三事件的档案呢？汉纳姆猜测：苏联在九一三事件上非常尴尬，他们虽然是最早到达现场的外国人，但只对飞机有兴趣，大块大块地拆解飞机零件，运回莫斯科，根本没有关心飞机上的人是谁。反而美国、日本、韩国都注意到中国的全面禁空令，估计出了大事，怀疑周恩来死掉了，都在密切关注摔毁飞机上的人员与中国政局的关系。而苏联居然没有警觉，非常迟钝。直到九一三事件一个月后，苏联人才重新返回坠机现场，挖开坟墓验尸，带回林彪，叶群的头骨和金牙。如果公布这一段档案，无疑等于暴露苏联人自己颓废无能、又不光彩的一面。

汉纳姆在文章中写道：“我到了俄罗斯首都。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寻找到在1971年底被派往蒙古的主要的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Vitali Vasilievich Tomilin）教授，他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前莫斯科第三医学研究所的头头，现在在一家地方太平间作顾问。”这回在电话中，汉纳姆还谈到苏联方面承认当年林彪在苏养病时，给林彪开的药方不好，虽非有意而为，确是损害了林的健康。

现在汉纳姆接触的两个苏联人都过80岁了，恐怕其中之一脑子已不清楚。汉纳姆表示采访九一三事件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愿意再看看当年的采访笔记

~~~~~

【往事非烟】

“文革”时期的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

• 孤 鸿 •

“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这是“文革”时长春市保温瓶厂青年工人李剑锋“反动”日记里的一句“名言”。诸多年来，他日记中其他的话我差不多都忘了，这句话我却牢牢牢记在心里了。当时心里暗暗钦佩李剑锋，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古文水平，似乎不比古文观止的范文差。

今天想起这段“名言”，是因为最近读过几篇网友关于日记的文章，于是很自然的回忆起了我知道的几个有关日记的故事。而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就是“文革”时期发生在长春市有名的因日记罹祸的著名事件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当时还发生过许多反动日记事件，只不过没有李剑锋出名罢了。

现在我努力回忆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的梗概，似乎发生在“文革”前期，是由于当时非常好学又喜爱古典文学的李剑锋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通信，不幸被警惕性极高的革命群众注意上的。其实他不过是想从王力教授那获得两本王力所著的古文教学著作《古代汉语》而已。

王力教授是那时我国古代汉语领域中泰山北斗级人物，文革前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被“监督改造”。他怕连累这个好学的小青年，就给李剑锋回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婉拒了李剑锋的请求。

在当时的中国，通信的自由和保密是不能得到保障的，李剑锋和反动学术权威王力的通信落到了群专组织手里，证据确凿，罪责难逃。令这些革命者大喜过望的是，在对李剑锋的追查过程中，又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果”，就是抄出了李剑锋的反动日记，李剑锋一时成了长春市著名的反动分子。于是李剑锋的反动日记遭受到全市、甚至可能是全省大规模、大密度的批判。其中受批判最多的反动谬论里就是这句“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正是因为那该死的日记，李剑锋本人多次遭到批斗。据说李剑锋能言善辩，语言辛辣，对于对自己的批判，他语含讥讽，常进行幽默俏皮的辩护和回击，致使严肃的批斗会常发生笑场，批判效果非常不好。

记得在这场席卷全市的批判李剑锋反动日记的喧嚣中，针对这几句话，我曾冒险写了一篇不敢见天日的模仿古文的读后感，其中有“善阿谀言者福，善忠直言者祸”的字样。短文写的

肯定是很拙劣，很幼稚。但是还是表达了对李剑锋的不自觉的认同和钦佩。

凡是极权专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是钳制言论自由的。晋代傅玄在《口铭》中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正是毛朝以言定罪现实的写照。而“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中最要害的一句就是“善言者，祸”。虽然只有四个字，却道出了当时红色恐怖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的实情。自49年以来，以言贾祸者不可胜数，仅1957年，卑鄙失信的阳谋，一网就打尽了55万右派，中右和漏网右派更不知几何。及至文革时期，因一时言语不慎而遭殃的情况更是到了恐怖的极限，连平日里无心无意之言，随便上纲上线，都会成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的口实。诚如林彪所说：“广大人民群众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甚至都不敢把对现实的真实看法记在日记里。

其实李剑锋日记写的很隐晦，虽然也有些苦闷、彷徨的情绪流露，却根本找不到对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不满的明确语言。但对当时大好的政治形势不满的态度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特别是日记里有“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的话，我记得，很多批判文章都提到了“反动透顶”的这句话。有文章发问：“谁争权夺利？谁是鸦，谁是朽木？”特别是日记里还有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评论，被当时批为“新三国论”。在一个封闭的像铁桶一样的社会里，李剑锋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当时只有四版的参考消息在国际新闻方面容量稍稍大些，但那里的资讯也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过滤，况且只有够一定的级别的人才能看到。我清楚的记得参考消息头版印的八个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今日看来，在几乎不掌握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情况下，去评论复杂的国际形势该有多么幼稚。实事求是的说，当时就是美苏两霸争雄，以中国的综合国力之薄弱远不足成为与美苏两霸鼎足而立之一足。但这至少表现出来李剑锋对中国的热爱和国家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日记的内容本来是个人隐私，实际上就是心灵独语。它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看到，甚至自己的父母也不行。由于记录的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基本没有什么约束。即使有些妄议时政，或直言对政权的不满和批评，也不会造成社会影响，因而绝不应该成为组织上迫害公民的理由，但是毛朝政权何曾有过这种胸怀和雅量？

也许我是见过李剑锋其人的，可惜是“无缘对面不相识”。上个世纪70年代重庆路新华书店的古旧文书店与大书店是隔开的，而且每个进去的人都要签名。有一次我进去签名时，惊喜的发现我的前一个签名就是“李剑锋”，字迹工整漂亮，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写反动日记的反动分子吧，当然也有可能是重名。可惜我不认得他，于是盯着每个二十来岁的人的脸仔细观察，分析猜测谁会是他。符合年龄条件者有好几个，终究不得相识。不可告人的是，我对这个反动分子没有一点仇恨，相反，倒是充满了尊敬，甚至崇拜，可能近似于现在的某些追星族心理吧。

屈指算来，李剑峰反动日记事件过去了也该有40年了。遗憾的是，时间久远，对于他的反动日记的其它内容我已记不得很多了。到今天，“文革”中的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工人现在也应该有六十多岁的年纪了。世易时移，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或相信我们曾有过写日记也会成为弥天大罪的时代？这说明至少在政治上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的。

李剑锋还算是幸运的，由于出身好，毕竟保住了性命。那时有个江苏省常州市某局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关了三年多。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历史的看，可以肯定的说，一个连写日记都有风险的时代一定是个荒唐的时代，一个连通

信自由都遭到粗暴践踏的国家一定是黑暗的国家。因此，要让我来说那个时代国家的统治者伟光正，实在是很难。

谨以此文衷心敬祝李剑锋先生幸福安康。

□ 原载《共识网论坛》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